

理论探讨

# 全球化：一项侧重认识论的分析

潘亚玲

[摘要] 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悖论表象之后,隐藏着深层次的认识论歧见。经济全球化日益使世界经济、社会、文化及政治生活一体化,经济自由主义也被认为能为世界人民带来和平与最大幸福,相互依赖成为时代发展一大趋势,而现代化则成为欠发达国家的一大追求。与此相反,许多人认为,国际政治分裂化现状难以改变,国家仍是人类正义的最好政治安排,经济保护主义不仅是欠发达国家、也是发达国家的一大选择,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往往是外国对核心依附的不断再生产,国家与民族传统特性的保持或许比现代化更为重要。这种认识分歧,根本上源于全球化导致的对秩序与正义要求间的内在矛盾。

[关键词] 经济全球化与政治分裂化;自由主义与保护主义;依赖与依附现代化与传统保持;秩序与正义

[中图分类号] D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55(2002) 01-0044-50

近几十年来,随着经济、技术及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全球化已逐渐成为我们时代的特征。然而,全球化本身即是一种悖论,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是矛盾的统一体。在这种表象背后,隐藏着深层的认识论歧见,本文就试图从经济全球化与政治分裂化、经济自由主义与经济保护主义、相互依赖与单向依附、现代化与传统保持等四个方面论述有关全球化的认识分歧,并试图说明全球化的实质,揭示其启示意义。

## 经济全球化与国际政治分裂化

全球化是一种过程,它促使世界各地的人们在经济、文化、政治、技术和环境等生活的各个方面越来越多地连结在一起。<sup>[1]</sup>全球化更为基本的是以经济全球化为主导力量,并对其他领域相关方面产生重大影响的过程。始于16世纪的欧洲经济向世界的扩展,导致了一个世界规模的贸易网的形成。<sup>[2]</sup>当今世界贸易量迅速由1950年的3080亿美元上升到1993年的3.8万亿美元,1997年上升到6.7万亿美元,估计到2010年将增至16.6万亿美元。<sup>[3]</sup>金融国际化进程明显加快,当今世界外汇日成交量约1万亿美元,若一国汇率或其他政策失当,几十亿美元的资金可在几小时内全部

撤离。生产的国际网络化业已形成。世界经济组织迅速增长,其中最为活跃的大概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等。<sup>[4]</sup>众多的跨国公司进行的不断增加的信息、资本和物资的交流也是全球化的主要动力之一。<sup>[5]</sup>技术上,新的国际信息与通讯系统加强了全球化的代理人(尤其是跨国公司)的地位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技术的全球化趋势打破了历来人类发展的最大的时间和空间限制,形成了所谓的“脱域机制”,<sup>[6]</sup>带动了人类在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sup>[7]</sup>

在社会、文化领域,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日益明显。首先是西方经济学在世界各地的大行其道,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休克疗法”、“渐进改革”等名词不绝于耳。其他学科言必称西方的风气日渐浓厚。更为众人熟知的社会、文化全球化现象则是随处可见的麦当劳文化、可口可乐文化、好莱坞文化等等。

经济全球化对政治领域的影响可能远大于其他领域,它不断冲击旧有的主权国家的基础。现代全球主义者持有相同的观点认为,自由贸易、国际合作能给世界带来和平;<sup>[8]</sup>并认为民族国家具有重大的缺陷;主权国家阻碍了和平与安全的实现;阻碍了世界社会中经济与社会正义的实现;阻碍了人类与生态环境的和谐

一致。<sup>[9]</sup>因而,他们指出通过经济全球化,构筑各式各样的专门的全球网络,将迫使国家让渡主权,最终实现主权国家的消亡。<sup>[10]</sup>德国哲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也认为,全球化的最重要的后果是“破坏了一度得以实现的社会福利国家妥协的历史局面”,“剥夺了调控国家进行干预活动的基础”,“使我们日益清晰地看到社会舞台的局限性、风险的共同性和集体命运的相关性。”<sup>[11]</sup>总之,经济全球化最终将超越民族国家。<sup>[11]</sup>

事实上,即使经济全球化进展迅速,伴随它的仍只是政治的分裂化。<sup>[12]</sup>国家主权观念是出现于16世纪末的关于国家政治与法理性质的概念,让·博丹第一次提出主权概念时就已指出,它是一种对内对外绝对和永久的至高无上的法律权威。<sup>[13]</sup>国家主权具有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国家对内法理或法律的统治权基于在领土内得到普遍承认的法律规则,国家是唯一合法的暴力垄断者;对外主权的本质含义在于独立,即自由决定自己的对外事务和对外政策,不受任何外部实体的支配。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后,国家主权得到欧洲国际社会的认同;<sup>[14]</sup>此后,主权观念逐渐扩散,首先是那些接受西方价值观的非西方国家,其次是所有二战后摆脱殖民地地位的新生民族国家。<sup>[15]</sup>因而,即便从国家有机论出发,国家主权也并未过时,相反可能正如日中天。布尔指出,远非如“主权过时论”者所说的那样,民族国家具有稳定国际、国内秩序的积极作用。<sup>[16]</sup>在维护正义、尤其是个人与种族间正义<sup>[17]</sup>方面,民族国家也同样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虽然它不是最理想的,但它是迄今为止人类正义的最好的政治安排。

### 经济自由主义与经济保护主义

经济全球化正成为我们时代的特性,但同样引人注目的、并行不悖的现象是经济民族主义和经济区域化、集团化。许多刚从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或者刚获得独立的民族国家为了真正实现自己的主权,正努力地追求实现自身经济的独立。<sup>[18]</sup>它们采取的是经济保护主义,或曰经济民族主义。部分发达国家对其经济的薄弱环节也同样实行保护主义,尤以美国的特别301等条款最为明显。在经济民族主义之外,经济上的区域国家联合大为盛行,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经济全球化与经济民族主义和经济区域化、集团化的矛盾,本质上是源于经济自由主义与经济保护主义的冲突。

经济自由主义源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

他认为,健全的社会经济活动是通过市场机制——所谓“看不见的手”——调节的,经济力量是自动、自主地运动的;国家应创造和维护市场运行的必要前提和条件,而不能限制经济自主运行。<sup>[19]</sup>此后,以杰里米·边沁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为代表的功利主义进一步发展了经济自由主义。他们指出,人类的行为应当以其后果,即是否促进“最大的幸福”作为评判其善恶的标准;<sup>[20]</sup>在国家与经济的关系中,国家以追求最大的经济福利为目标,而经济是自动、自主地运行的,因此国家的职责就是尽量少地干预经济活动,为其提供尽可能的自由。如果国际社会中的所有或大多数国家都奉行这种经济自由主义政策,那么随着经济联系、尤其是商业联系的加强,通过交换实现双赢的机会大为增加,同时战争的代价日益高昂,<sup>[21]</sup>国家间“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sup>[22]</sup>必将为和平状态取代。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和边沁、穆勒的功利主义为以理查德·科布登和约翰·布莱特为首的“曼彻斯特学派”所继承,形成了“商业和平论”,<sup>[23]</sup>这成为20世纪威尔逊主义的一大理论基础。20世纪后半期兴起的全球主义也继承了这一派思想,认为经济自由主义能够为全世界人民带来和平与最大幸福。

然而,由于自由贸易所导致的经济利益分布大不相同(往往对霸权国家有利)、市场开放对不同国家的社会稳定影响不同、以及自由贸易体制往往能加强发达大国的国际政治权势,在大国倾向于经济自由主义的同时,中、小国家却宁愿采取经济保护主义。<sup>[24]</sup>经济保护主义源于重商主义,在他们看来,国际经济中存在稀缺,一国的经济优势只能以他国弱化为代价,因而通过扩大对外出口、减少进口来保护本国贸易、聚积国富以增长国力尤为重要。<sup>[25]</sup>路易十四的财政部长让·科尔柏是重商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他成功地运用重商主义为17世纪后半期法国的强大奠定了物质基础。<sup>[26]</sup>重商主义对后来的经济思想有着重大影响,斯密虽是经济自由主义的鼻祖,但他也接受重商主义的某些信条,尤其在关系国家安全问题时。<sup>[27]</sup>汉密尔顿对经济自由主义的批判可谓经典,<sup>[28]</sup>他强烈主张新生的美利坚国家实行经济民族主义,通过政府保护和资助本国工业以打破英国对世界贸易的垄断,通过使国民经济多样化实现国家安全,通过形成美国的制海权、保护美国商业且使美国成为欧洲的制衡者,成为一个海洋大国。<sup>[29]</sup>德国思想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国民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关注点是权势,主张将国富与国力

结合起来,实际上回到了重商主义。他认为一国经济发展必然经历三个阶段:落后的农业自然经济阶段、工业和外贸初生阶段及发达阶段。每一个阶段的发展战略各不相同,但总的说来前两个阶段应当奉行以重商主义为核心的经济民族主义,国家积极干预、调控社会经济;到了经济发达阶段,便应将国家政策重心转向为经济自由主义。<sup>[50]</sup>这实质上指出了全球化趋势下经济全球化与经济民族主义、经济区域化与集团化矛盾的根本原因。<sup>[51]</sup>

本质上,经济自由主义也是一种经济民族主义,它历来都是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占据优势地位的国家用以维持和增长这种优势的工具,其思想内涵便是以“王道”形式掩盖其“霸道”本质。政治需要决定经济战略:民族国家在追求权力的同时,也塑造着最合乎其意愿的国际经济。20世纪后半期,它集中体现为霸权稳定论。该理论认为,在现代市场条件下,霸权国家的存在稳定了整个国际体系、建立了强大的国际机制,有可能形成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而且,霸权国家也能够提供全球范围的“公益和服务”,世界很多国家能从中受益(如免费搭车等)。<sup>[52]</sup>但霸权国之所以促进稳定开放的国际经济体制的形成,是因为它降低了霸权国维持其权势地位的成本,促进了经济福利和增长,增强了霸权国的经济杠杆作用。而霸权国提供“公益和服务”的能力也有可能推动甚至强迫其他弱国参与开放的体制。<sup>[53]</sup>

今天,与经济全球化相对立的经济区域化、集团化及经济民族主义正是以重商主义为代表的经济保护主义的对应物。实行经济保护主义的国家往往采用“重商主义工业化”或“国家资本主义的赶超模式”以改变自身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不利地位,最为成功的当属亚洲新兴国家采取的“进口替代战略”及“出口导向战略”。

### 相互依赖与单向依附

经济全球化主要在四个方面体现出来:世界贸易量的快速增长,全球资金流动量大大增加,外国直接投资大量增加,以及跨国公司、全球经济组织作用上升等。今天,经济全球化使世界各国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相互依赖日渐加深,几乎很少有国家能独立于世界经济之外自行发展。现代化的脱域机制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显得尤为明显。在全球化的重大经济问题上,各国间的相互依赖显现得更为清楚。1994年墨西哥金

融危机和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都几乎给世界经济带来致命打击。这两场金融危机的处理与解决,不是单凭某一国家的力量,也不是战争;而是依靠有目共睹的各国间相互依赖的力量。

经济全球化下的相互依赖助成了国际制度理论的兴起;而国际制度理论也相当集中地体现了相互依赖的精神理念。国际制度理论认为国际制度能使处于相互依赖中的国家的行为变得较以前更有预期。这种预期作用体现在国际制度能提供一种其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的延续性意识;提供大致可预期的互惠机会与可能;提供关于体制成员行为表现与体制运行动态的连续信息;提供解决或缓和国际争端和冲突的途径。<sup>[54]</sup>因而建立能塑造和巩固这种预期的国际制度对于促进相互依赖、保障世界和平很有必要。在国际制度理论中,相互依赖约束了国家无限制使用暴力的倾向,因而国际和平变得更有保障。

经济全球化下的相互依赖也助成了从理论上解决落后国家走向发达与成熟道路的现代化理论。借用传统社会学的“传统——现代”理想模式,<sup>[55]</sup>现代化理论认为所有社会都是有机体,都会经历一个前后相继、由低到高的成长过程(如传统社会——起飞准备——起飞——走向成熟——大众高消费五阶段论等)。<sup>[56]</sup>成熟、先进的社会都是由不成熟、落后的社会发展而来的,由此可得出结论,近代西方现代化国家的成长经验应当被当作普遍有效的模式,欠发达国家可通过相互依赖,学习近代西方现代化国家的成功经验,实现本国的工业化、现代化。<sup>[57]</sup>

与上述理论相反,一些思想家认为,经济的全球化并不必然带来相互依赖,对此应当作仔细区分。相互依赖意味着平等,因而只能产生于国际分工中地位、等级大致相同的国家之间,如西方与西方、欠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而在国际分工中地位、等级不相同的情况下,即在发达工业国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相互依赖的经济关系是不存在的,代替它的是欠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的单向依附,<sup>[58]</sup>代表这一思想的主要有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

在说明欠发达国家之所以欠发达的原因和根本出路方面,依附理论与现代化理论相互对立,它们对核心——外围结构<sup>[59]</sup>的效应有着根本相反的解释。现代化理论认为,把第三世界国家整合到资本主义网络(全球化)中将导致其发展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进入成熟阶段,并能够实现自主自强与现代化。而依附理论却

认为,这种整合只能使第三世界被限制在发达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国际交换网络中,为发达国家提供剥削源泉,导致外围对核心依附的不断再生产,永久性地把欠发达国家置于依附地位,阻碍其自强自主、繁荣发展的可能。<sup>[40]</sup>依附论基于“外部依靠”、“有限机会”及“内部分裂”三个概念,认为在结构性原因(资本主义体系内的有限机会)存在的条件下,如果一国不能完全实现其经济周期(需要外部支持),再加上国内的不整合,就会导致依附产生并不断再生产。<sup>[41]</sup>从依附中摆脱出来有两种替代性选择,一是激进的社会主义革命,一是具有经济保护主义实质的国家资本主义。<sup>[42]</sup>

世界体系论主要由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创建,他认为世界体系既是整合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又是分裂的主权国家的政治组织体系。世界体系的形成与扩展同经济的一体化(今天的全球化)过程密切相关,呈现出核心——半外围——外围的结构特征。在经济一体化过程中,核心国家对外围和半外围国家不断地进行剥削。半外围国家则一方面遭受来自核心的剥削,另一方面又剥削外围国家。处于国际经济分工最底层的外围国家不断遭受来自核心和半外围国家的剥削,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给外围国家带来的不是相互依赖,而是不断再生产的对核心与半外围国家的单向依附,使其无法取得迅速的自立的经济发展,无法迅速现代化,助长了其落后与贫困。与依附论不同的是,世界体系论不认为(半)外围国家无法改变现状,它可以在内、外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实现国家地位的相对上升——虽然这相当困难也相当罕见。<sup>[43]</sup>

### 现代化与传统性

经济全球化给世界各国带来了巨大的机会。各国都必然会尽力抓住每一个有利机会,努力实现自身财富、权势的巨大增长,并寻求改变自身国际地位的可能。一个国家加入全球体系涉及到诸多问题,其中包括该国经济本身的历史性发展——它影响着这个国家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同时还涉及地缘、经济、政治、制度和文化等方面的重新整合过程。<sup>[44]</sup>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趋向之一是欠发达国家的逐步现代化,虽然其程度及能否改变其依附地位尚存在疑问。

现代化被认为大约于十七世纪出现在欧洲,此后范围不断扩大并程度不同地对世界各国产生着影响。<sup>[45]</sup>国际社会理论认为,现代国际社会规则的发生相对于基督教国际社会和欧洲国际社会规则的演变的

根本动力可能在于现代化。<sup>[46]</sup>国际社会的扩展以及判断一国是否文明的标准也都在于现代化。<sup>[47]</sup>运用社会学分析方法且持西方中心论的学者认为,现代化进程实际上是欠发达国家加入全球体系的“社会化”<sup>[48]</sup>进程。根据世界体系论,现代化进程实际上是资本主义体系的扩张过程,它表现为核心对外围、半外围的剥削关系的不断深化和扩展。深化是指已被纳入资本主义体系的国家进一步资本主义化的过程;扩展是指资本主义体系不断扩展并逐渐包容新的地区和成员的过程,从欧洲到美洲再到亚洲、非洲,这是一种侧重地缘意义的经济与政治扩张过程。<sup>[49]</sup>

另一些思想家则认为,经济全球化必然带来现代化的观点存在着致命的缺陷。因为依据现代化理论,现代意味着先进、发达,而传统社会的价值观、体制、行为方式都是不发达的表现和原因,并构成现代化道路上的主要障碍。要进入现代世界,欠发达社会就不得不超越传统的规范与结构,为社会、经济和政治过渡开道。<sup>[50]</sup>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对传统的超越才意味着现代化呢?现代化的成功是否意味着对传统的革命?

应当认识到,现代性是传统的现代性,应用联系的观点看待现在和过去的关系,通过更新(变革)而非断绝与过去的关系而区分出现代。<sup>[51]</sup>社会实践总是不断地受到关于这实践本身的新知识的检验和改造,从而在结构上不断改变自身,因而现代与传统并没有截然的鸿沟,现代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得以实现的,这也就是吉登斯所说的“现代性的反思性”。<sup>[52]</sup>如果“以前如此”与人们新获知识发现的“应当如此”在原则上完全不相吻合,那么日常生活中的一切都将无章可循,现代化也无从谈起。因而现代化仅仅是点上的断裂,而在整个人类史层面上却是与传统成为一连续体。

以此为出发点,反现代化的思想家们认为,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下,欠发达国家虽应把握住机会,争取自身现代化的实现;<sup>[53]</sup>但要保证在国家现代化的整合过程中不致因为对传统的过度破坏而导致出现过度的失衡并进而引起社会革命的可能,一国更应尊重自身传统的价值观、体制和行为方式,选取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实现经济全球化的本土化(indigenization)。<sup>[54]</sup>本土化即在寻求尊重自身传统的基础上,将全球化与自身传统相结合,对传统中的不适应甚至阻碍现代化的部分进行渐进的变革,缓解甚或消除激进现代化的震荡与因循守旧的反动,争取用一种“中庸主义”的方法调和二者的关系,其实质是充分认识到全球化与多样化

的并行不悖,以“从全球着想,从本地着手”为出路。

### 结 语

全球化,如同所有其他现象一样,是个矛盾的统一体,它总存在着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悖论。在这些现象背后,存在深层的认识论歧见,突出表现在上文所述的四个方面。究其实质,是全球化导致的在秩序和正义上的不同要求间的矛盾与冲突。

全球化的秩序要求表现为那些在全球化趋势中获得最多或较多的国家尽力维护和强化这种既得利益,并进而寻求建立和强化一系列能保证这种既得利益的机制。大力强调经济全球化、谋求消除民族国家,只不过是那个别国家力图以自己的主权取代别国的主权,实现自身主权的普遍化。经济自由化则被霸权国家用作打入欠发达国家市场的工具,进而使欠发达国家对其的依附不断得以再生产。主张以现代化消灭别国传统特性的国家同样基于类似目的。总之,全球化的秩序要求主要体现了发达国家(或霸权国家)维护或增强自身权势与维持保证其既得利益的秩序及其稳定的要求。

与之相反,全球化的正义要求则往往为欠发达国家、或那些在全球化趋势中失大于得的国家所强调,它们要求实现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公正、平等,这是一种非常强大的道德力量,导致了巨大的逆全球化趋势。正因为如此,经济全球化才未能消灭国际政治的分裂、实现普泛帝国;经济自由主义未能完全清除经济保护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单向依附的加深也并未阻止欠发达国家谋求地位上升的变革与革命;现代化的力量也未能阻止全球化的本土化。全球化所唤起的正义要求体现为对现存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变革、甚至是革命性的要求。

秩序与正义永远难以协调,<sup>[55]</sup>其唯一的解决方法是对二者进行适当的中和,既不能逆全球化而行,也不能因为维护全球化的秩序而无视欠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的正义要求。唯有在全球化唤起的秩序要求与正义要求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全球化才会真正带来最大的福利。

### [注释]

[1] 乔治·洛奇:《全球化的管理——相互依存时代的全球化趋势》[M],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 [2] 雅克·阿达:《经济全球化》[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52页。
- [3] 俞正梁等著:《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7—178页。
- [4] 关于国际经济组织的论述,可参见Craig N. Murph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Industrial Change: Global Governance Since 185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5] 洛奇:《全球化的管理》,第7页。
- [6] 关于“脱域机制”内涵的论说,参见安东尼·吉斯:《现代性的后果》[M],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8—26页。
- [7] 洛奇:《全球化的管理》,第1页。
- [8] 时殷弘、叶凤丽:“现实主义·理性主义·理想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传统及其当代典型表现”[J],《欧洲》1995年第3期。
- [9] Hedley Bull, “The State’s Positive Role in World Politics,” in Herbert M. Levine ed., *World Politics Debated: A Reader in Contemporary Issues*, 2nd edi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 1989), p. 24.
- [10] L. Ali Khan, *The Extinction of Nation-states: A World Without Borders* (The Hague, London, Bosto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1996), chaps. 4-8.
- [11] 于尔根·哈贝马斯:“超越民族国家?——论经济全球化的后果问题”,乌·贝克、哈贝马斯等著:《全球化与政治》[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71—90页;引语见第77、76、82页。
- [12] 洛奇:《全球化的管理》,第3页。
- [13] William Ebenstein ed., *Great Political Thinkers: Plato to the Present*, 3rd edition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60), P. 349.
- [14] Lynn H. Miller, *Global Order: Power and Valu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oulder and London: Westview, 1985), pp. 24-25.
- [15] Stanley Hoffmann, “Hedley Bull and His Contribu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86, p. 187.
- [16] Bull, “The State’s Positive Role in World Politics”.
- [17] 关于世界政治中的正义问题,见时殷弘:“论世界政治中的正义问题”[J],《欧洲》1996年第1期。

- [18] R.J. 文森特:《人权与国际关系》[M],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107页;时殷弘:“21世纪发展中国家的基本任务”[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5期。
- [19] Raymond G. Gettell,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New York and London: The Century Co., 1925), pp. 272-274. 关于斯密经济思想的介绍,可见 A. W. Bob Coats, *O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British and American Economic Essays*, Vol. 1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chap. 7.
- [20] Tom L. Beauchamp and Teery P. Pinkard eds., *Ethics and Public Policy: An Introduction to Ethics*, 2nd edition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1983), 2-4. 对边沁和穆勒的功利主义的至今最好的阐述,参见亨利·西季威克:《伦理学方法》[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尤其第四编。
- [21] Stephen Krasner, “The Accomplishment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n Steve Smith, Ken Booth, and Marysia Zalewski eds., *International Theory: Positivism and Beyo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09-119.
- [22] 霍布斯对国际无政府状态的阐述,见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M],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十三章。
- [23] Gettell,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pp. 274-342.
- [24] S. Krasner, “State Power and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World Politics*, Vol. 28, No. 3 (1976, 4), pp. 317-347.
- [25] Gettell,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pp. 264-266.
- [26] Ibid., p. 266; Derek Mackay and H. M. Scott, *The Rise of the Great Powers, 1648-1815*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1983), pp. 17-24.
- [27] Edward Mead Earle, “Adam Smith, Alexander Hamilton, Fredrich List: 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Military Power,” in Peter Paret ed.,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From Machiavelli to Nuclear Age*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220-230; Coats, *O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Vol. 1, chap. 8.
- [28] 见《联邦党人文集》第6章。
- [29] Earle, “Adam Smith, Alexander Hamilton, Fredrich List,” in Peter Paret ed.,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pp. 230-242.
- [30]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国民政治经济学》[M],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 [31] 经济全球化与经济民族主义、经济区域化和集团化间的矛盾,从某种角度而言是国家处于不同发展阶段而采取的不同经济战略。这与亚当·沃森在阐释主权问题时所作的分析有一致之处,发展中国家强调主权独立、内外事务不受干涉,而发达国家则正在超越独立国家的思想而主张全球经济及更严苛的人权标准。Adam Watson, “Foreword,” in James Der Derian ed., *International Theory: Critical Investigation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xiv.
- [32] 关于霸权稳定论,参见 Robert O. Keohane, “From After Hegemony,” in John A. Vasquez ed., *Classic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3rd edition (New Jersey: Upper Saddle River, 1996), pp. 353-361.
- [33] 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31—533页。
- [34] 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第401页;时殷弘:“安全两难与东亚区域安全体制的必要”[J],《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4期。
- [35] J. Samuel Valenzuela and Arturo Valenzuela, “Modernization and Dependency: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in the Study of Latin American Underdevelopment,” in Heraldo Munoz ed., *From Dependency to Development: Strategies to Overcome Underdevelopment and Inequality*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81), p. 17.
- [36] Heraldo Munoz, “Introduction: The Various Roads to Development,” in idem ed., *From Dependency to Development*, p. 1; Kenneth E. Bauzon and Charles Frederick Abel, “Dependency: History, Theory, and A Reappraisal,” in Mary Ann Tetreault and Charles Frederick Abel eds., *Dependency Theory and the Return of High Politics* (New York and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86), p. 45.

- [37] J. S. Valenzuela and A. Valenzuela, "Modernization and Dependency," in Munoz ed., *From Dependency to Development*, pp. 19-20.
- [38] K.J. Holsti,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3rd edition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1977), pp. 97 - 91.
- [39] 核心——外围结构是现代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范式,认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存在着核心——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与外国——欠发达国家的区别。核心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居主导地位,而外围则处于资本主义体系的边缘,对它们的相互关系及这种关系的变革方法的不同认识,产生了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及世界体系理论等。
- [40] Bauzon and Abel, "Dependency: History, Theory, and A Reappraisal," in Tetreault and Abel eds., *Dependency Theory and the Return of High Politics*, pp. 43-69.
- [41] James A. Caporaso and Behrouz Zare, "An Interpretation and Evaluation of Dependency Theory," in Munoz ed., *From Dependency to Development*, pp. 45-48.
- [42] Bauzon and Abel, "Dependency: History, Theory, and A Reappraisal," in Tetreault and Abel eds., *Dependency Theory and the Return of High Politics*, pp. 50-62.
- [43]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M],第一、二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Thomas Richard Shann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World-System Perspective* (Boulder, San Francisco, & London: Westview Press, 1989), esp. Chap. 2.
- [44] 米哈里·西梅:“前言”,帕德玛·德塞主编:《走向全球化:从计划向市场的过渡》[M],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 [45] 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第1页。
- [46] 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London an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36.
- [47] Hedley Bull and Adam Watson eds., *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Clarendon, 1984); Gerrit W. Gong, *The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Clarendon, 1984).
- [48] 有关“社会化”的涵义,参见沙颂主编:《社会学概论》[M],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48—55页。
- [49] 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二卷; Shann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World-System Perspective*.
- [50] J. S. Valenzuela and A. Valenzuela, "Modernization and Dependency," in Munoz ed., *From Dependency to Development*, p. 18.
- [51] 唐文明:“何谓现代性”[J],《哲学研究》2000年第8期。
- [52] 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第32—39页。
- [53] 关于欠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任务,可见时殷弘:“21世纪发展中国家的基本任务”。
- [54] 罗兰·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245—247页。
- [55] Hoffmann, "Hedley Bull and His Contribu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184.

作者简介:潘亚玲,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社科教研室讲师,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生。(上海,200433)

收稿日期:2001-08-14